

# 今天我们如何读史

## 核心阅读

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及其事业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历史中探寻追溯。这即是读史的意义所在。

□ 王学斌

“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历代执政者治国理政的重要凭借与资鉴。在今年1月3日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何尝不是对广大领导干部的要求？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那什么是“历史感”？借用清初大儒王夫之的话，即“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换言之，应将历史作为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之桥梁，从中体察出关乎当前发展之通识。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不光要勤于读史，更要善于读史，须能见其真、见其全、见其大、见其远、见其深，从而培养良好的历史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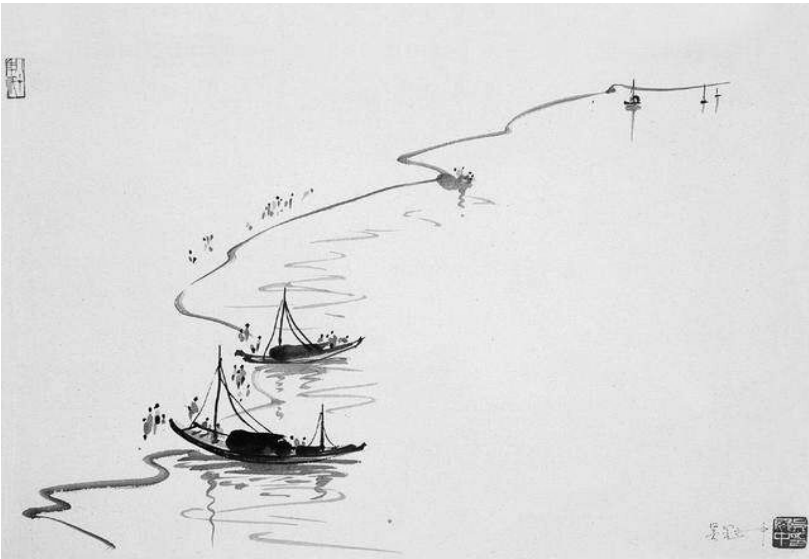
## 读史须见其真

毫无疑问，求真乃历史研究的本质宗旨，也是人们了解历史的一大诉求。倘涉猎的作品史观不正确或史料有讹误，有可能会误导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把握。近些年来，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国史、党史，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一些误读误解或一味出奇的观点，甚至存在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且该思潮在传播方式上趋于网络化、日常化、娱乐化，呈现形式上趋于学术化、热点化、隐性化，比如对民国史的过度拔高甚至美化为“黄金时代”，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否定与抹杀、对英雄模范人物的歪曲与丑化等，势必对领导干部的历史认知产生不良影响。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

（上接1版）

在困难面前勇于斗争。敢于斗争、敢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从血肉腥风的战争年代到激情燃烧的建设时期，无数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以“拼将十万头颅血”的无畏、“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到了愈进愈难、不进则退又非进不可的时候，领导干部必须敢于冒风险、涉险难、攻坚克难，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干劲，不断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在事业面前勇于争先。领导干部要把心思集中到干事上，把责任体现在勇于干事上，把才气展现在会干



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准确把握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才能探究真相，悟出真理，得其真意。

## 读史须见其全

中西历史，延续不辍，史实之众，浩如烟海。就个体而言，终其一生，也不可能知晓所有历史。因此，领导干部要留心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用心审视历史的演进脉络。历史非一团乱麻，无章可循，仔细梳理，即可发现其主峰所指，主脉所在。如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有利无弊，且时间愈久，弊端愈多，终致难以为继，改弦更张。

例如创立于隋唐的科举制，其初衷在于打破门第界限，给更多人参与治理的机会，显然符合历史趋势。其后千年，执政者对此制度也不是简单地萧规曹随，而是多有因革损益。宋代鉴于唐时科考流于宽松、作弊频生的问题，规定试卷必须糊名、考试内容聚焦儒家经典，于是制度愈益严格。到了明代，执政者储才理念有了新变化，专设翰林院，由此科举不单可以选拔人才，还被赋予了培养人才的功能。制度日益繁密，流弊随之增多。降至清代，科举制问题已无法回避，清中期关于改革考试制度的议论逐渐兴起。然而争议久久未决，稳妥替代方案迟迟难产，终致科举制在1905年仓促落幕，留下了新旧教育机制接轨困难、士绅阶层渐趋消亡等一系列后遗症。可以说，一项科举制，半部中国史。以此为例，可知任何制度都是针对现实而设，同时又蕴含着稳定的内在精神。所以虽其经常处于调整更改之中，但只要不与核心精神相悖，便可以沿袭下去，且持之有效。即使某制度百弊丛生，到了非废不可之际，仍须通盘考虑，拿出妥当方案，以避免急遽变动所引发的动荡与倒退。是故制度之得失利弊，往往很是复杂繁琐，常需历久始见，将其放入贯通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看得全，看得透。这对于从事各级治理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关联紧密，值得参考。

## 学出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怀德自重、坚守正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高度重视纪

## 读史须见其大

南宋朱熹认为读史当“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古代中国并无政治学科，历史实际上承载着提高执政者政治素养的功能。因此古人读史，犹如模拟政治操作的沙盘推演，紧扣大事件，从而扩展胸中之格局与见识。古代王朝，通常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自当善于观察这些王朝因何而兴，缘何而亡。特别是要关注一个朝代陷入存亡绝续之际的“大关键处”，解剖一只麻雀，总结共性规律，从而达到预防风险、举一反三的效果。

作为唐初名臣，魏征不仅谙熟政治，而且精通历史。他参与主持了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历史撰述，并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帝纪总论以及《隋书》纪传的全部史论。通过研究前史，魏征提出“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的深刻见解，以亡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并且魏征进一步强调，隋朝的灭亡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这种历史洞察力和比较视野，展现了其宏大的关怀，堪为读史见其大的典范。

## 读史须见其远

《吕氏春秋》有云：“见之以细，观化远也。”观史当从具体案例中研判大趋势，形成一种长远眼光，这恰是史学致用的鲜明体现。

众所周知，作为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粮食，番薯和玉米是在16世纪末期由南美洲几经辗转传入中国的。殊不知这两种貌似不起眼的农作物，对之后500多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自清代康熙朝起，随着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人口进入激增状态，几乎每百年增加一亿人。这势必造成人口扩张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迫于压力，清政府于乾隆五年颁布谕令，“嗣后凡边省、内

总书记多次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要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做到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保持政治定力。领导干部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不断清扫思想上的灰尘，永葆政治本色。要以淡泊之心对待“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以平常之心对待“位”，以进取之心对待“事”。

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衷垦种，免其升科”。于是掀起了一股开发、垦殖西北、西南、东南诸省的热潮。番薯、玉米的引进和种植无疑缓和了人口急剧增长对粮食需求的紧张。这两种农作物“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加之番薯“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玉米“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宜勤锄，不须厚粪”，所以在引进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西北和南方广大丘陵旱地迅速上升至主粮的地位。例如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贫民纷纷携家带口来西南、东南等地拓荒开垦，络绎不绝，某些州府几年内户口骤增数十万。与此同时，正是政府的大力推广，导致人们盲目种植番薯、玉米等农作物，破坏了森林植被，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贫瘠。清人汪士铎就曾慨叹：“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最终带来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决策，皆须立足长远，倘只顾眼前，畸形发展，到头来必将贻害后世。是故以史为鉴，汲取教训，才能保证事业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留得久。

## 读史须见其深

《易经》中讲“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对此话的感悟是“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也就是说，读史不仅明智，更能修德。读史读到深处或渐入佳境之时，人们在意的往往不再是某人某事、一得一失，而是形成一种共情效应，专注于追求与思索蕴含在史籍背后的德行和传统，一番淬炼、体悟后，最终内化为个人的心智修养。经此过程，读史者变化了气质，净化了心志，无论是看过去、当下还是未来，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贺信中所指出的史学“资政育人”的作用。该过程其实并不玄妙，领导干部只要沉潜史书之中，悉心品味，定能通过涵养政德，收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之效果。

清代学者张惠言有句名联曰：“上古下今，所思不远，诵经绎史，其乐在斯。”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及其事业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历史中探寻追溯。这即是读史的意义所在。因此广大领导干部应当心怀温情与敬意，于阅读和思考中知古鉴今、古为今用，形成强烈的历史感，在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充分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



淬炼道德定力。领导干部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要坚持正心明道、见贤思齐，多一些“清夜自省”，多一些灵魂叩问，在

不断省察中提高思想境界，做到慎独慎微，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增强抵御腐定力。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保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秉持初心、怀德自重、洁身自好、清廉自守，时刻牢记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以法纪战胜贪欲，在各种诱惑面前，眼不花、心不乱，始终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

公元1038年，党项拓跋部落历经李继迁、李德明两代积累，在李元昊带领下创建了著名的西夏王朝，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夏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项部落发源于青藏高原，随着吐谷浑、吐蕃势力的强大被迫离开故土。随着唐王朝的建立和强大，在唐太宗李世民“夷夏一家”的民族包容政策引导下，党项部落在唐初内附，并迁居陕北黄土高原，在唐末建立了以夏州为核心的强大地方势力。从青藏高原走向黄土高原，意味着党项人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也标志着党项人和汉族等民族进行全面的交流与合作。党项人对于唐王朝的向往和忠诚在协助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中全面展现，唐文化对党项人影响深刻。在这个过程中，党项人广泛吸收汉唐文化，日常交流也以汉字为主，汉传佛教也基本成为党项人的主要信仰；这对后来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唐末宋初，党项人逐步控制了陕北高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以及青海新疆部分地区，完成了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西夏文明。

## 大国夹缝中的独立政权

西夏王朝建立以后，前期与北宋、辽对峙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后期对南宋、金三国鼎立，立国190余年，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的少数民族政权。

作为一个在宋辽金等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独立政权，西夏王朝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以务实外交为导向，在夹缝中巩固和稳定政权。西夏王朝存续期间，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农业、牧业、冶铁业发展，西夏控制著名的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通过历代开发，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西夏统治者鼓励开荒和农耕，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被广泛引入，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取得了空前发展，建成了兴庆府这座仅次于长安城的西北地区大型城市。西夏时期，重视与周边政权的贸易往来，其中所产夏州一带的青盐、河西走廊的骏马成为当时与北宋进行榷场贸易的重要物资；其锻造的“夏国剑”更是享誉天下。由此可见西夏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准。近年来，随着西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大量的民间契约文书相继得到整理，表明土地买卖、商品交易在西夏境内非常频繁。这些历史表明，西夏已经从游牧民族转型成为农耕为主、牧业为辅的典型农耕社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西夏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全面向中原王朝学习。西夏建国初期，李元昊学习唐宋制度，创建西夏文、确立官制、兴修水利、确立军事制度和法律制度，建立了一套全面吸收唐宋文化和党项民族特色的治国制度。历代西夏最高统治者都高度重视法律制度建设，如李仁孝在位期间颁布的《天盛律令》，展示出了西夏王朝极高的立法水准和成就，与《宋刑统》并列为那个时代的杰出立法成果，同时也是当时第一部全面刊印的治国法典。《天盛律令》上承《唐律》，下接《宋刑统》，中纳党项人特色习惯法，成为融会贯通中原文明和党项文明的经典之作。

在长期和宋朝对峙期间，西夏给宋朝西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等著名战役中，西夏军队多次以少胜多，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中原王朝对西夏的存在十分敌视，称西夏为伪夏。在西夏的后期，蒙古人征战四方，成吉思汗20多年中多次发动征服西夏的军事行动，但遭到西夏人的强烈抵抗，成吉思汗病逝在攻灭西夏之即，是故蒙元政权对西夏也是相当敌视。蒙古灭夏过程对西夏文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蒙古人编修《辽史》《金史》，独不修“西夏史”。

##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高度融合

西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党项人的民族特色，使西夏文明具备典型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西夏地

# 西夏：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少数民族王朝

□ 余钊飞

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既有黄河冲积平原和肥沃的河西走廊，也有贺兰山、祁连山等著名的山地草场，也有贫瘠的陕北高原和一望无际的大漠。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西夏境内的经济生产方式具备了多样性。西夏既有党项族原本擅长的牧业经济，也有新开疆土肥沃平原的农耕生产；因此从经济发展形态上看，西夏国的农牧业并行发展；同时由于西夏控制丝绸之路的要道，因此也比较重视商业贸易。

党项人作为游牧民族，以军马立国，重视传统畜牧业。《天盛律令》中关于畜牧业生产的法律条文是唐律的数倍，且内容丰富。如《牧场官地水井门》《牧盈能取事管门》《校畜磨勘门》中对于官牧场的界限、管理机构、畜产品交纳都有细致规定，同时也对于畜产品的生产使用和交易作出了相应规定。这些措施相较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的法典有着显著的民族特色。自党项人占据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后，西夏开启了农业立国的历史进程，“以农为本”的立国思想和儒家治国思想在西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西夏对于农田水利建设极其重视。《天盛律令》中《春开渠事门》《灌渠门》《地水杂罪门》等法规对农田、水渠、灌溉、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都作了详细规定。

农业的发达为西夏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等中原王朝的政治文明开始在西夏结出新硕果。西夏中后期以儒教治国，主要表现在制度、法律和教育上。西夏的崇宗乾顺重视文教，大力发展儒学，建立学校，在西夏文化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其子仁宗仁孝，提倡文教，实行科举，修订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更使西夏尊崇儒学达到顶峰。《天盛律令》更是一部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典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主刑辅”唐律核心思想贯穿始终；“十恶”“五刑”“八议”“五服”“七出”等中原王朝法典的经典制度在其中全面展现，深刻体现了西夏中后期“礼法合一”的立法思想；也象征着党项人在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方面的卓越水平。此外，佛教是西夏宗教信仰的主流，由于皇室大力提倡，官方色彩浓重。西夏的佛教源于中原，又借鉴吐蕃，佛道兼容是西夏的一大特色。

